

## 國民政府對德日「防共協定」的因應

蕭李居

### 摘要

1936年11月，德國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Antikomintern-Pakt）。以往學界對於此議題都視為德日關係史領域，由德國或日本的觀點進行探討，忽略中國對於此協定的觀察與反應。本文擬由中國的視角出發，考察中國對於該協定的看法與因應。

德國與日本簽約後都聲明並無秘密條款，但無法取信於世界各國。中國方面透過駐外使節偵查以及報紙報導，探訪到各種密約內容，最後駐蘇大使蔣廷黻由蘇聯方面獲知秘密議定書內容，但無法確認此件情報的可靠性。中國方面對於此協定可能的影響，主要關注於中德軍事合作與中日關係。表面上中德仍維持友好關係與軍備貿易，但是中國已有疑慮，蔣介石計劃推動以中英軍事合作取代，卻未能成功。而該協定有邀請第三國參加的條款，德日訂約之時適逢中日調整國交談判，談判期間日本提出簽訂中日「防共協定」的要求，中國拒絕。中國乃透過外交管道與德國外交部交涉確認並要求保證，避免日本透過協定利用德國施壓中國加入。中國偵查相關情報與外交因應措施的過程，印證「情報驅動外交（intelligence-driven diplomacy）」觀點，即所謂情報輔助外交談判的重要性。最後，經由此案例可知，1930年代中德關係與德日關係的本質差異；前者主要建立在傳統官方關係，後者則與納粹黨關係密切。

關鍵詞：防共協定、中德關係、中日關係、程天放、情報

#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German-Japanese Antikomintern-Pakt**

Li-chu Hsiao<sup>\*</sup>

## **Abstract**

In November 1936, Germany and Japan concluded the Antikomintern-Pakt. Previous research examined the ev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rmany or Japan, ignoring China's observations and reac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China's views on the agreement and its responding measures.

Upon concluding the Pact both Germany and Japan declared that there were no secret clauses, but the claim was not believed by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possible secret clauses from diplomatic envoys and newspaper reports. Chiang Ting-fu,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obtained the content of secret claus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but was un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as reliable. China's main concern about the Pact was its impact on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lthough China and Germany still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 and an arms trad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worried. Chiang Kai-shek tried to replace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a Sino-British one, but the effort was not successful. The Pact had provisions for inviting third countries to join. As Germany and Japan signed the Pact, a Sino-Japanese talk on readjusting relations was being held. China rejected Japan's proposal of signing a Sino-Japanese Anti-Comintern Pact during the talk.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China requested assurance from Germany that it will not pressure China to enter into such an agreement on behalf of Japan because of the Antikomintern-Pakt.

---

<sup>\*</sup>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view of “intelligence-driven diplomacy.” It also reveal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Sino-German relations and Japanese-German relations at the time. While the former was based primarily on traditional official ties, the latter was connected through the Nazi Party.

**Keywords: Antikomintern-Pakt,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eng Tian-fang, intelligence**



# 國民政府對德日「防共協定」的因應\*

蕭李居\*\*

## 壹、前言

1921年5月20日，北京政府與德國政府簽訂「中德條約」，是中國與列強簽訂首件明文規範無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及協定關稅，可謂完全平等互惠的條約，此後兩國關係在此基礎上迅速發展。<sup>1</sup> 中德關係在1930年進一步發展，由民間商業貿易擴展為政府之間的合作。國民政府借助聘任德國軍事顧問團與輸入德國軍火，逐步建設現代化軍隊以厚實國防實力；德國方面也加強與中國的貿易，積極進口國防原料並傾銷軍火武器。此期間中德關係的建立是在不考慮共同的戰略需求之上，發展彼此受益的軍事關係。<sup>2</sup>

在中德維持互利的平等軍備貿易關係時，德日兩國於1936年11月25日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komintern-Pakt）」（以下簡稱：德日「防共協

---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訂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8年6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7月17日。

\*\* 國史館協修

<sup>1</sup>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04-109。時任外交總長顏惠慶指出：「德國聯邦既已備受凡爾賽條約懲膺，態度不免柔馴。同時因熱望與我國早日發生商務關係，一切頗事遷就，故所締之中德復交條約，完全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該項條約公佈後，一般印象極佳，實為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對外簽訂的平等條約。」請參閱：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09-110。

<sup>2</sup> 柯偉林（W. C. Kirby）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序言，頁2。

定」)，並同時對外公布協定內容，但事實上仍有未公開的秘密議定書。德國就其國家利益，基本上此時對中日兩國採取「等距離外交」政策，即親善中國並結好日本，視中國為德國重整軍備、擴充軍力的軍備貿易伙伴，也把日本作為戰略上牽制蘇聯和英國的東方盟友。<sup>3</sup> 然而，對於中國而言，德日兩國過密的接近並締結政治性條約，將可能衝擊中德軍備貿易，因為中國方面透過與德國軍事合作，提升與強化中國軍備力量的目的即在對抗日本的侵略。德日簽訂協定也可能影響中日關係，因為就在該協定簽署的3個多月前中日兩國已展開調整國交談判，並於兩週前的11月10日結束第七次會談，中日對於化解已然惡化的邦交關係仍無共識，德日的結合可能對中國談判帶來壓力。

有關德日「防共協定」的研究議題一般被視為德日關係史的範疇，多被置於該兩國關係史領域，由日本或德國視角進行探討。以往論者基本上以1940年9月「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為主題，回溯探討德日「防共協定」，論述兩國締結協定的過程，以及分析協定性質的特異性，並進一步探究自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掌權以來德國內部的二重外交問題。<sup>4</sup> 近年來論者對德日「防共協定」進行更深入的論述，透過與德國展開交涉協定的駐德大使館武官大島浩的訪談，以及討論德國納粹黨的遠東政策，並運用德國方面關係人員文書等原始史料，探查此協定的濫觴，同時分析德日未公開的秘密附屬議定書，以蘇聯為假想敵國，卻以「反共產國際」為名的原因。<sup>5</sup>

至於在中日或中德關係史的研究成果上，多是關注德國軍事顧問團與中德軍火貿易的史事，甚少專文討論德日「防共協定」議題。即使偶有觸及此事，亦僅為簡單之史實描述，或略述對中德關係的不良影響，對於中德關係的發展有深入探討，<sup>6</sup> 但未特別針對該協定進行分析與論述中國方面的觀察與反應。在中德日

---

<sup>3</sup>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新華書店，2003年），頁44-45。

<sup>4</sup> 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東京：南窓社，1975年），頁35-56。

<sup>5</sup> 三宅正樹，《近代ユーラシア外交史論集：日露独中の接近と抗争》（東京：千倉書房，2015年），頁123-138；田嶋信雄，《ナチズム極東戦略：日独防共協定を巡る諜報戦》（東京：講談社，2001年第2刷），頁66-148。

<sup>6</sup> 周惠民，〈德國對「滿洲國」及「汪政權」的外交態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157-159；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三民書局，

三國關係史的研究，近年論者亦有探討德日「防共協定」的議題，惟其重點在描述德日兩國談判經過，雖然有略述中國方面對於協定的態度，但是在此部分僅引用駐德大使程天放〈使德回憶〉資料，未引用中國官方檔案等史料，因此完全不清楚程天放與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針對此議題交涉的前因後果，難以準確並全面性呈現中國的態度。<sup>7</sup>

一直以來外交對於國際關係的型塑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情報資訊更是外交決策與活動不可或缺的依據，故有所謂「情報驅動外交（intelligence-driven diplomacy）」的說法，即將情報視為談判背景下對於外交官交涉的輔助與支持。<sup>8</sup> 本文擬以國史館典藏的《外交部檔案》與《蔣中正總統文物》等檔案為主，輔以報紙的相關報導，探討中國偵查德日「防共協定」秘密條款的過程，以及對於該協定的因應態度，並據以考察此協定對於中國造成的影響。期望藉由此議題的考察與分析，呈現外交活動與情報運用的過程，開拓並深化「情報驅動外交」相關案例的研究。最後，也希望透過此案例重新檢視並認識1930年代中德關係的本質。

## 貳、秘密條款的報導

1933年3月，日本政府不滿於國際聯盟通過「李頓調查報告書」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調查與處置，決議退出國際聯盟。同年1月，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亦稱國社黨）在德國取得執政，為了重整軍備，也於10月退出國際聯盟與裁軍會議。上海市長吳鐵城於10月24日分析國際局勢的變化指出：「德退國聯，日引為得意，希特拉〔按：希特勒〕政府亦有親日之趨勢。」<sup>9</sup> 可以說已預測同年退出國

---

1995年），頁88-89。

<sup>7</sup>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頁117-128。

<sup>8</sup>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55.

<sup>9</sup> 「吳鐵城致蔣介石漾午電」（1933年10月24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六）〉，《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

際聯盟的德日兩國日後接近及合作的可能性。

約1年9個月後，共產國際於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會中針對國際情勢的變動指出，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經濟鬥爭的結果，造成世界勢力的重新劃分，並以日本帝國主義首開行動，同時法西斯與資本主義諸國亦以蘇聯為敵。因此大會決議賦予全世界共產黨的任務為：1. 為擁護和平及蘇聯而鬥爭；2. 結成反德國、日本及波蘭等戰爭挑撥者的統一戰線；3. 結成反法西斯與帝國主義的鬥爭；4. 對軍國主義及軍備展開鬥爭；5. 打倒排外主義；6. 援助中國紅軍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等。<sup>10</sup>

就在共產國際公開以日本與德國為鬥爭目標的國際背景下，德日於次年11月簽訂「防共協定」。此事的關鍵人物為居中聯繫並積極推動的日本駐德大使館附屬武官大島浩，而讓其萌生與德國締約構想係因鑑於1905年7月德俄兩國締結卻未生效的「邊雅閣條約」，<sup>11</sup> 對於日俄戰爭期間的日本造成了可能性的危險。大島為了預防類似德俄合作的情勢再次出現，構思推動德日聯盟，讓蘇聯無法減輕來自德國的軍事壓力，<sup>12</sup> 避免蘇聯武力得以全力東指而威脅日本。

1935年9月，大島透過德國武器商人威廉哈克（Wilhelm Hack）向納粹黨主導外交事務的「里賓特洛甫機關」主任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試探，德日以蘇聯為對象締結防禦性同盟的可能性並獲其認同，開啟日後兩國交

---

090103-00016-016。

<sup>10</sup> 〈外事警察資料：コミンテルン第7回世界大会の概況〉，《內務省》，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0440700。

<sup>11</sup> 由於德國自1890年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法俄兩國乃於1894年1月締結同盟協約，法國亦於1904年與英國年簽訂「英法諒解條約」，造成包圍德國的局勢。德國期望爭取俄國來改善外交困境，利用日俄戰爭期間俄軍戰敗以及俄國國內革命運動沸騰的契機，由德皇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邀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於1905年7月24日在芬蘭邊雅閣（Bjorko）會面，並簽訂防禦性同盟的「邊雅閣條約」。威廉二世希望俄國出面邀請法國加入，共同對付英國，打破德國外交孤立情勢。然而，由於德國首相與俄國外相均反對該約，加上俄國以擴大法俄同盟讓德國加入為由徵詢法國而遭到反對。尼古拉二世不得已向威廉二世建議在該條約加上不適用於法德爆發戰爭的條款，但德國認為不符其利益未予同意，致使該條約最後無疾而終。請參閱：王曾才，《西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91年第7版），頁19-20。

<sup>12</sup> 三宅正樹，《近代ユーラシア外交史論集：日露独中の接近と抗争》，頁127。

涉商訂協定的談判。大島的構想與行動一開始即獲得日本參謀本部的同意與支持，並進一步於次年5月取得外務省的認同，自陸軍方面接下交涉任務，改由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負責與德國談判。顯示此時廣田弘毅內閣認可陸軍方面聯合德國的想法，積極推動所謂「防共外交」，<sup>13</sup> 自然與共產國際公開以德日為敵的國際背景有關。德國方面仍然由里賓特洛甫出面洽談，依舊避開外交部與日本交涉。10月23日，兩國結束談判事宜，11月25日，里賓特洛甫與武者小路在德國柏林外交部正式簽訂德日「防共協定」。<sup>14</sup> 簽署儀式當日，除了蘇聯大使之外，各國駐德大使均應邀觀禮，主動促成此事的大島亦出席典禮。<sup>15</sup>

德日「防共協定」相關文件包含當時已經公開的協定正文與附屬議定書，以及未公開的秘密附屬議定書共3件。公開的協定正文與附屬議定書內容如下：

「反共產國際協定」

大日本帝國政府及德意志國政府鑒於共產國際（所謂第三國際）之目的在於運用一切手段，破壞及威脅現存國家，並確信忽視共產國際對於各國內政之干涉，不祇將構成其國內安寧與社會福祉之危機，且亦足以成為整個世界和平之威脅。為亟欲對共產主義之陰謀活動作自衛之合作起見，茲特締結如下協定：

第一條、締約國約定對於共產國際的活動相互通報，協議必要的防禦事項，並透過密切的合作以實行之。

第二條、締約國對於因共產國際的破壞工作而國內安寧受到威脅之第三國，依據本協定之旨趣採取防衛措施，並共同邀請其參加本協定。

第三條、本協定以日文及德文文本為正本，自簽字之日起實施，有效期間為五年。締約國在此期限未滿前之適當時期，對於兩國彼此

<sup>13</sup> 大畑篤四郎，〈日独防共協定・同強化問題〉，日本國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5）：三国同盟・日ソ中立条約》（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頁12。

<sup>14</sup> 有關德日交涉及締結「防共協定」的詳細過程，請參閱：三宅正樹，《近代ユーラシア外交史論集：日露独中の接近と抗争》，頁123-144；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頁35-56；田嶋信雄，《ナチズム極東戦略：日独防共協定を巡る謀報戦》，頁65-148；大畑篤四郎，〈日独防共協定・同強化問題〉，頁3-54；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頁117-128等。

<sup>15</sup> 〈德日反共協定 昨在柏林舉行簽字〉，《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6日，版6。

合作方式應進行協商。

「反共產國際協定」附屬議定書

茲於本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之際，全權代表協議如下：

- (一) 兩締約國主管機關密切合作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之情報，及揭發與防禦共產國際之辦法。
- (二) 兩締約國主管機關對於直接或間接在國內或國外，服務於共產國際，或助長其破壞工作者，應於現行法律範圍內採取嚴格之措施。
- (三) 為讓兩締約國主管機關容易按前項規定進行合作起見，應組織常設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商討協議各種防止共產國際破壞工作所必要的措施。

至於德國與日本閉門簽署而未公開的秘密附屬議定書內容為：

「反共產國際協定」秘密附屬議定書

大日本帝國政府及德意志國政府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為了努力實現共產國際之目的，且因此投入軍隊。此事實不僅僅威脅兩締約國的存在，亦嚴重威脅到世界和平。為了擁護共同利益，兩國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締約國一方遭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非挑釁性攻擊，或非挑釁性攻擊威脅的情況，則另一方締約國有義務不採取減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負擔效果的措施。發生前揭情況時，締約國雙方應立即協議採取措施保衛共同利益。

第二條、締約國在本協定有效期間，未經對方的同意，不得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訂結任何違背本協定精神的政治條約。

第三條、本協定以日文及德文作為正本。本協定與本日簽署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生效，並具同一有效期限。<sup>16</sup>

<sup>16</sup> 外務省歐亞局，「昭和十一年度執務報告」（1936年12月1日），〈執務報告：昭和十一年度歐亞局第一課〉，《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0097200；「共產『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にする日独協定」（1936年11月25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6刷），頁352-354。

該協定實質上是德日兩國透過秘密款條以蘇聯為目標的防衛性政治條約。但是，締約後日本外務省立即發表聲明指出：「本協定之目的，僅在共同防禦共產國際」，「本協定之宗旨，即在此一端也。本協定背後並無任何他種協定，蓋日本政府不欲成立或參加任何特別國際集團也，再本協定非對付蘇聯或其他任何一國者。」<sup>17</sup> 德國外交部於簽約儀式結束後，旋招待各報記者，說明此項協定的條文，<sup>18</sup> 即公開揭露的協定正文與附屬議定書內容。德國官方並透過在上海的德國新聞社發表聲明稱：「德日近頃締結之協定，並非同盟性質，亦非軍事協定，其關涉者，亦僅為兩締約國。」<sup>19</sup>

然而，德日締結密約事早已風傳多時，外交界與媒體界並已猜測其將以表面的防共協定掩護背後的軍事條約。當日本政府與德國方面於10月23日完成談判事宜並將協定草案送交樞密院審議，樞密院在11月13日至18日期間審查通過時，新聞媒體方面已探得消息，並於11月18日大肆報導：「美國巴爾蒂摩亞太陽報編輯柏特森氏（Paul Patterson）於前日下午，由日乘輪抵滬時，曾向報界宣稱，日本已於兩星期前，與德國商妥同盟云云。」<sup>20</sup> 翌日，中央社依據蘇聯官方機構塔斯社發表的消息指稱，蘇聯駐日全權代表尤列涅夫（Constantin Youreneff）經由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探悉，「日本與某強國組織同盟的防止共產之談判，目前已在進行中。」至於「所謂第三國者，絕為德國無疑，並謂一種對付蘇俄之協定，現已在東京簽訂第一字矣。協定之內容，表面上雖以互相防共為目的，但實際上係為日德兩國另一種秘密條約之烟幕。」<sup>21</sup>

《中央日報》於11月21日社評針對中央社所稱表面的防共協定與秘密的條約內容進行評論：「德日同盟之性質，據以前消息，內容分軍事同盟與共同防共兩

<sup>17</sup> 〈日外務省宣言〉，《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6日，版6；外務省歐亞局，「昭和十一年度執務報告」（1936年12月1日），〈執務報告：昭和十一年度歐亞局第一課〉，Ref. B10070097200。

<sup>18</sup> 〈舉世矚目之德日反共協定簽字〉，《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6日，張1版4。

<sup>19</sup> 〈德方在京發表聲明〉，《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6日，張1版4。

<sup>20</sup> 〈美記者由日抵滬談日德同盟成熟 日方即提樞密院審議〉，《申報》，上海，1936年11月18日，版9；〈美太陽報記者談德日將簽協定 目的為共同防蘇〉，《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18日，張2版1。

<sup>21</sup> 〈成立反蘇聯陣線 盛傳德日已簽訂協定〉，《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19日，張2版1。

部分。關於軍事同盟之部，據蘇聯方面情報，謂德日兩國『已約定簽字國一方或雙方與第三國發生戰爭時，彼此採取一致行動。』此外尚無所聞，故不能遽為斷定。惟是共同防共之部，則各方消息皆證明其為德日諒解之動機。」<sup>22</sup> 可知，雖然德日兩國公布協定條款，並聲明其背後並無其他條約，但新聞媒體在此之前已猜測德日將以檯面上的防共協定掩護秘密的軍事條約。蔣介石於德日締約當日午間即由報告獲悉公開的協定條文，<sup>23</sup> 雖然未知密約內容，但仍批評「德徒見武力而不重外交，其愚極矣。」<sup>24</sup>

11月25日，德日締約的同一日，駐法大使顧維鈞訪晤法國外交部政務司長後，亦觀察當地晚報的評論報導，並電呈外交部參酌：

何以日本貿然與德攜手，插足于歐之糾紛。據東京官場說明，說日德協約僅以第三國際為目標，並非對俄，但英、美、法政府均不信之。其實在原因乃為德允助日改良日本軍隊，使完全現代化，其影響足以推翻世界均權。<sup>25</sup>

法國晚報雖然未明言德日另有密約，但稱德國將助日改良軍隊等語，即是暗示實際上另有秘密軍事約定。

翌日，顧維鈞再致電外交部，報告有關歐洲其他各國新聞界報導的訊息。其中，瑞典各報稱：「日德應付本國共產宣傳綽有餘力，毫無協定之必要，斷定另有密約。」波蘭報界亦謂：「波蘭政府反對主義上之爭鬥，並信防共協定為軍事協定之掩飾，將促進俄英之合作。」<sup>26</sup> 同日，倫敦大使館也來電云：「日德協定條款公布後，英報論調稍趨和緩，惟一般意見皆不贊同此項政治理想為口號之組

---

<sup>22</sup> 〈社評 德日同盟之觀察〉，《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1日，張1版3。

<sup>23</sup>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9冊（臺北：國史館，2009年），頁298-302。

<sup>24</sup> 《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6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下同。

<sup>25</sup> 「顧維鈞致外交部第326號電」（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協定〉，《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02-0165-0063。

<sup>26</sup> 「顧維鈞致外交部第330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7。

合，視為富有危險性，且疑其尚有秘密條約。」<sup>27</sup> 27日，安戈拉領事蕭繼榮電外交部報告有關土耳其報紙報導稱：「防共不過藉詞，暗中必尚有軍事條件，共同對蘇，以各遂侵略之野心。」<sup>28</sup> 荷蘭海牙公使館也來電報告當地報紙評論指出：「德日原防共產活動，若無秘密文件，實無訂約必要。」<sup>29</sup>

中國相關報紙的報導亦引用國際消息刊載各國新聞界對於德日「防共協定」的看法。11月26日，《申報》轉載塔斯社電稱，莫斯科方面新聞云：「希特勒組織所謂反布爾希維克集團之企圖，因德意及德日協定之締結，已開始實現於國際間。」並逕言批評「此所謂反共主義之口號，實為自欺欺人之假面具。」<sup>30</sup> 28日，塔斯社方面再傳出《消息報》著文評論：「柏林協定，其目的無非藉此而隱蔽侵略國之秘密軍事協定。該同盟之簽訂，非僅以蘇聯為對象，即其他各國亦必被顧及，每個參加國均擬利用該約，以完成各個之侵略及征服策略。」<sup>31</sup>

另外，11月27日，中央社引用倫敦哈瓦斯電指出，德日在柏林簽訂的「反共協定」附有秘密議定書，其內容略為：1. 將荷屬東印度群島，劃分為德日兩國經濟勢力範圍；2. 解決戰前德國在太平洋各島屬之問題。同時據莫斯科路透電稱：「據聞此間已獲有證明之文件，發覺德日除反共協定外，更締結一種秘密條約。此事已引起蘇俄各界更進一步之憤怒。」<sup>32</sup> 《申報》社論據此評論：「就協定的性質論，在公開發表的內容中，雖沒有顯明的軍事同盟條款，但協定正文第一條既規定對共產國際的活動要採取合作防衛策略，而議定書又規定設置常務委員會，以辦理這合作的防衛事情，則軍事合作的意味已經夠濃厚了。」「至於《倫敦標準晚報》所傳的秘密條款，假使成為事實，則德國將放棄收回太平洋舊有島嶼的主張，而對日本的南進政策問題開個方便之門，此其結果，日本大陸政策的

<sup>27</sup> 「倫敦大使館致外交部第267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1。

<sup>28</sup> 「蕭繼榮致外交部第117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03。

<sup>29</sup> 「海牙公使館致外交部第135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05。

<sup>30</sup> 〈俄報觀察 日德利害衝突點〉，《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6日，版6。

<sup>31</sup> 〈德日協定目標所在 莫斯科報之觀察〉，《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8日，版7。

<sup>32</sup> 〈英倫報紙揭發 德日協定秘密議定書〉，《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7日，張1版4；〈秘密條款〉，《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7日，版7。

推進，自必為無顧忌，而我國所處地位亦必益感困難。」<sup>33</sup>

事實上，倫敦哈瓦斯方面所指的秘密議定書內容為德日處理有關太平洋殖民地諸島問題，已是該年4月中旬的舊聞。當時各界均極力探詢德日是否秘密簽署協定的消息，倫敦媒體於4月13日探悉相關條文謂：「據云殖民地一項問題亦已加入約文之中，德國在太平洋上原轄有馬紹爾、瑪里亞那與加洛林諸島，歐戰之後，乃由國聯會委託日本代管，但以日本不在各該島嶼設置防禦工事為條件，日本迄未遵行。此次日德兩國協商條約成立之後，德國對於此等島嶼，承認放棄一切權利，並承認日本在各該島嶼享有完全主權。」<sup>34</sup>不過後續查無實證，此項消息逐漸平息。德日簽訂並公布協定後，此議題再度被提出當成秘密條款，但仍難以證實。

至於德日劃分荷屬東印度群島勢力範圍一事，依據駐海牙公使金問泗於12月1日致電外交部表示，據荷蘭外交部秘書長密告：「德日將和〔按：荷〕屬東印度劃分活動範圍之消息，係俄籍記者PONIKOF向Evening Standard傳播，以冀鼓動輿論。該記者所說不確等語。」<sup>35</sup>簡言之，新聞界方面既不相信德日兩國所稱並無秘密條約，但亦追查不出其他不同而且準確的內情。

### 叁、秘密條款的探查

1936年11月21日，中央社電稱，外務省承認柏林傳來日本與德國間即將締結文化協定之消息的正確性，但表示不僅限於德國，日本亦將與其他各國簽訂該項協定。不過，報導同時指稱，稍早外務省發言人也於當日公開發表：「日本因鑒於第三國際之國際組織，故現將與對第三國際感有同樣威脅之其他各強國，從事

---

<sup>33</sup> 〈時評 日德反共協定的檢討〉，《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8日，版7。

<sup>34</sup> 〈巴黎日內瓦盛傳日德秘密諒解 對俄開戰彼此軍事合作 德放棄太平洋島嶼注目〉，《申報》，上海，1936年4月13日，版5；〈法名記者揭發 日德協商條約消息〉，《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4月13日，張1版4。

<sup>35</sup> 「金問泗致外交部第137號電」（1936年12月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217。

組織共同陣線之政策。」<sup>36</sup> 此二說讓新聞界以及駐日大使館注意到關連性，紛紛猜測德日將以文化協定掩飾其密約的可能性。

駐日大使館注意到此二說的關係，彙整多日來探得傳聞的德日密約內容，於11月21日致電外交部指出：

獨和〔按：德日〕間密議內容傳說紛紜，總括推定，表面以將發表之文化協定為掩飾，其密約內容雖未達軍事同盟程度，聞含有如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攻擊時，不予第三國以任何援助供給，及相互謀軍需工業上之技術合作等重要條款。大抵以協同防共為目的，避免反蘇字樣。<sup>37</sup>

11月23日，外交部致電駐德大使程天放，除了轉述駐日大使館的來電消息，同時也訓令程天放：「查日德密約現遍傳世界，且事關東亞，應由該大使親晤德外長，詢問真相，一面仍在各處設法探查內容電部。」<sup>38</sup> 程天放隨即與德國方面接洽，獲得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約定11月25日簽訂協定之日晤面。會晤當日，牛賴特即謂：「君今日不來見，余亦將約君。」隨即送交協定德文本，並表示：「此協定磋商已有數月，定今日下午簽字，同時公布。」又謂：「條文並無其他條件，英、法報紙所傳均不可靠。」<sup>39</sup> 會晤結束後，程天放致電外交部，表示牛賴特「已電令駐華大使面交鈞部，故此電不複述。但晚報披露則除去正文外，尚有全權議定書三點。」<sup>40</sup>

<sup>36</sup> 〈日本準備與德締結文化協定 防止第三國際威脅〉《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2日，版7；〈日當局承認將與德國 將訂文化協定說〉，《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2日，張1版4。

<sup>37</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58號電」（1936年11月2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49。

<sup>38</sup> 「外交部致程天放第396號電」（1936年11月2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62。

<sup>39</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1月25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下同。

<sup>40</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49號電」（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66。程天放於回憶錄指出：「講了幾句寒暄話後，他〔牛賴特〕就拿一份德日反共條約和議定書的副本交給我，講這件事磋商了幾個月，最近才商定，今天下午在柏林簽約。」惟參照日記與致南京外交部電文，可知當時牛賴特並未交付協定的附屬議定書，此段回憶的描述有些許誤差。請參閱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傳記文學》，第4卷第6期（1964年6月），頁18。

牛賴特故意安排於德日簽約之日與程天放會晤，並表明會面的期望，意在第一時間告知公開的協定內容，藉以否認外傳尚有其他同盟性質的密約。

同日晚間，顧維鈞也來電稱：「頃訪法外部政務司長，探詢關於日德協約問題，駐各國之法使有何報告。渠言：『駐德法使電告：今午德外部以日德約文面交駐德外交團，對法使並言，事先曾與義國商洽，且聲明此外別無密約。東法使亦報，日外相未加說明。』」不過，法國外交部政務司長最後卻認為，「日德協約，反共其名，合作其實。否則兩國相距甚遠，無協定之必要也。」<sup>41</sup>

此外，德國國防部也於11月25日致電在華德國軍火商人克蘭（Hans Klein）：「陶德曼（德駐華大使）已奉命向中國政府正式解說一切，必可使中國政府完全放心。」並且說明「『協定』之中，僅為防衛〔範〕國際化之宣傳總機關（第三國際），絕不反對任何一國家，亦不反對俄國。協定無他，即是歐洲反共陣線範圍之分子，類似與義大利及多瑙河諸國之商洽也。上項事實，台端盡可正式應用無誤。」<sup>42</sup> 克蘭隨即向軍政部長何應欽出示此件電文並說明情形，指出此協定「僅限于思想及文化方面之合作，專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之總宣傳機關，絕無政治或軍事合作意義」，希望代為向蔣介石解釋一切。克蘭同時向何應欽表示，接獲柏林私人來電稱：「日德洽商事件，係由國社黨部文化部所為，醞釀已久。專以對共產主義之國際間聯絡。反方面肆意宣傳，冀淆惑聽聞。〔國防部長〕白倫堡〔按：柏龍白（Werner von Blomberg）〕部長全然不知，欲阻碍此事之進行，似亦不難云云。」<sup>43</sup> 同日，資源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灝也往見克蘭探詢密約內容，克蘭亦對之出示柏林友人來電，略謂：「德日協商僅限於思想及文化方面，以抵攻國際間之共產宣傳總機關，絕談不到政治或軍事問題。」<sup>44</sup>

德國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為納粹黨「里賓特洛甫機關」主任里賓特洛

<sup>41</sup> 「顧維鈞致外交部第327號電」（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65。

<sup>42</sup> 「德國國防部致克蘭電譯稿」（1936年11月25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50。

<sup>43</sup> 「何應欽致蔣介石徑未電」（1936年11月25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11-193。

<sup>44</sup> 「翁文灝致蔣介石有酉電」（1936年11月25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典藏號：002-090103-00011-195。

甫負責交涉並簽署，德國外交部與國防部均不認同。惟柏龍白事先已經知情，<sup>45</sup>但能否予以阻止則有疑義，此說法恐怕是國防部為避免此協定破壞對華軍備貿易的遁詞。可知，德國國防部第一時間透過克蘭向中國解釋此協定為單純的防範共產國際，並未反對蘇聯，絕非是軍事合作的條約，意在避免對中德軍備貿易關係造成影響，同時也是在明白澄清該協定並無軍事合作之密約。

但是，德國的否認並未能消除中國方面懷疑協定背後尚有秘密同盟的存在。11月26日一早，程天放觀察德國報紙已經轉載英法各報有關協定的報導，均疑尚有未公布之條件，且多批評之詞。此後趁著參加茶會時機與各國使節談論協定之事，<sup>46</sup>並據此致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朱家驊指出：「日德協定，此間報載及議定書三點，昨已在柏林東京同時公布。傳說尚有秘密之軍事及經濟同盟，但無從證實。」<sup>47</sup>同時也致電外交部，表示美、法、俄駐德各大使均懷疑協定外尚有其他未公開之條件，但不能得確證。蘇聯駐德全權代表亦謂：「俄認日德間已有對俄軍事條件，無論兩國對外為何解釋，俄仍積極準備。即雙方同時動作亦不畏。」<sup>48</sup>

同日，駐蘇大使蔣廷黻亦電告外交部，表示經連日與各方談話，並據以分析認為確有密約，由日本主動要求，最主要條款即兩國宣言反共，及德國供給日本軍器及製造軍器之技術秘密。<sup>49</sup>翌日，駐日使館來電報告：「日德聞另有軍事互助案，兩國軍事當局正在交涉中。」<sup>50</sup>12月1日，參謀本部轉致外交部有關駐日

<sup>45</sup> 1935年9月，大島浩與里賓特洛甫接觸試探德日以蘇聯為對象締結防禦同盟後，日本參謀本部派遣情報部歐美課德國班班長若松只一中佐前往柏林，以了解里賓特洛甫態度與德國國防部長意向。若松於11月底至12月中旬在柏林期間，除了親自與里賓特洛甫會談外，也拜訪德國國防部長柏龍白，表示日本方面認為防共協定僅是一件普通條約，並且尚需經兩國政府同意。請參閱：大畑篤四郎，〈日獨防共協定・同強化問題〉，頁19；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頁101。

<sup>46</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1月26日。

<sup>47</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譯轉朱家驊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2。

<sup>48</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50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5。

<sup>49</sup>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918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84。

<sup>50</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67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

海軍武官劉田甫的情報，略云：「日德確有軍事密約，正在協商中。日本因綏遠問題吃緊，故速發表日德防共協定，以期轉移各國視線。」<sup>51</sup> 同月2日，駐英大使郭泰祺對新聞界發表談話，略謂：「關於德日兩國反共協定，中國輿情可概括說明於下：（一）此項協定，除官方所發表者外，深恐另有秘密條款。（二）協定措詞籠統，或可誘致他國簽字加入。」<sup>52</sup> 可知，外交界方面普遍認為日德「防共協定」附有秘密文件，但一時之間查無內幕消息。

有關蔣廷黻所稱條款內容基本上為軍購之合作，與締約前11月18日駐日使館探悉德日有軍需工業合作條款，並未達到軍事同盟程度的訊息相同，<sup>53</sup> 而且似無保密之絕對必要。故而外交部依據駐日使館11月27日的訊息，於同日分電訓令程天放與蔣廷黻：「本部確悉，德日除已公布之文件外，尚有秘密議定書，內容未詳，希密探。」<sup>54</sup> 11月29日，程天放參加使節團茶會，探訪協定相關消息。<sup>55</sup> 翌日，復電外交部稱：「協定外是否另有密約，傳說紛紜，殊難下斷語。如有確定再行奉閱。」<sup>56</sup> 蔣廷黻則於12月1日復電表示，因為蘇方要人連日忙於開會，無法接洽，故暫時無進一步消息。但是，李維諾夫於大會演講，其中提及「日德協定經十五閱月之交涉，必非簡單之主義，協定必有秘款」等語，頗堪注意。<sup>57</sup>

就在程天放與蔣廷黻暫時探查不到秘密議定書的內情時，其他使館則傳來新的情報。12月1日，駐捷克公使館致電外交部稱：「據捷克政府情報，日外相曾

---

010102-0165-0099。

<sup>51</sup> 「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一處致外交部抄電」（1936年12月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1。

<sup>52</sup> 〈郭大使談德日協定疑含有秘密條款 中國恃自力防共〉，《申報》，上海，1936年12月3日，版6。

<sup>53</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53號電」（1936年11月18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33。

<sup>54</sup> 「外交部致柏林大使館第399號電」（1936年11月27日）、「外交部致莫斯科大使館第616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02、020-010102-0165-0106。

<sup>55</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1月29日。

<sup>56</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51號電」（1936年11月30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18。

<sup>57</sup>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921號電」（1936年12月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15。

向捷使稱：『協定僅附有秘密議定書，申明兩國非經互商，不能與任何第三國訂有侵犯條約。』」<sup>58</sup> 同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則根據探悉情報電告外交部：

據報日德間除防共協定外，另有軍事互助協定。內容計十七條，規定締約國之一與俄開戰時，他國應實行軍事上之合作。若遇一般戰事，應採友誼中立云云。下午訪俄大使，據密告：「日德秘密議定書內容尚未偵悉，如有所得當即密送。惟主要對象除蘇聯外，尚有英國，並載有締約國之一不得對方同意，不能與第三國訂立任何協定。」<sup>59</sup>

駐捷克使館獲悉的德日秘密條款尚屬於消極的不可與其他第三國簽訂侵犯條約，但經由駐日使館探悉的情報內容，則是以蘇聯為目標並在開戰時採取軍事合作，與其他國家的戰事則採取中立，可謂相當地具有積極性與針對性。

12月3日，許世英再致電外交部指出：「某方消息，日德協定附屬軍事議定書草約已簽字，莫斯科不久可揭載全文。」<sup>60</sup> 外交部於5日致電駐蘇大使館，轉知來自許世英報告的消息並訓令：「即向蘇外部探詢究竟，隨時電部。」<sup>61</sup> 蔣廷黻於9日下午拜會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多蒙涅可夫（B. S. Stomoniakov），次日復電外交部表示，據其云德日確已簽訂軍事議定書，蘇聯政府並已探得條文。然而，蔣廷黻請其抄示一份時卻遭到拒絕，僅表示未到時期。故而蔣廷黻再問該議定書條款、內容及有無副件等問題，斯多蒙涅可夫答復：「就記憶所及，有兩三條，及若干副件。」並口述議定書條文為：

1. 兩締約國之一受第三國之侵犯或侵犯威脅時，第二締約國不得有不利於第一締約國之舉動。
2. 凡事有關兩國之共同利益，締約國未經協商，不得與其他國家訂雙面的

<sup>58</sup> 「布拉格公使館致外交部第65號電」（1936年12月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8。

<sup>59</sup> 「許世英致外交部第674號電」（1936年12月1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5。

<sup>60</sup> 「許世英致外交部第679號電」（1936年12月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9。

<sup>61</sup> 「外交部致莫斯科大使館第620號電」（1936年12月5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37。

或多面的條約。

3. 兩國參謀本部於最短時期內商議細目協定。

兩國簽字之時並同意諒解事項二點：

1. 兩國非經協商，不得復入國聯。
2. 兩國共同認為非戰公約不適用於第三國侵犯威脅之狀況。

斯多蒙涅可夫認為德日「防共協定」附屬議定書第二項所謂得在國外採嚴重步驟，日本曾得德國諒解，國外係指中國。日本必化公約與秘約為一而利用之，以遂其向華侵略目的。不過，蔣廷黻對於此軍事秘約的情報內容卻有所質疑，認為：

按斯所云，雖甚確切，然亦有待考之處：（一）蘇聯既有條文，何不公布？（二）條文不多，何以不能記憶確切，而祇云兩三條及若干副件。（三）蘇聯得自何處？（四）斯氏所云與李維諾夫初次告余者，不全符合，或者斯氏之消息係根據秘探以告，是否完全正確，似尚待考。<sup>62</sup>

蔣廷黻指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初次所告內容，為兩人於11月19日會晤時所告之。當日李維諾夫表示德日同盟「確有其事，係日方主動，初由日本駐德武官與Ribbentrop〔按：里賓特洛甫〕接洽，並不經兩國大使之手。最近始改由正式公開交涉，現已由駐德日使簽字。約有兩種：一公約將公布，內容僅定反對共產主義；密約，內分兩款：（甲）兩國軍事協助，以對某第三國、（乙）兩國不與此第三國訂任何根本妥協條約」等。<sup>63</sup> 李維諾夫透露的「某第三國」或「此第三國」即意指蘇聯，顯示了德日締結密約明顯具有針對性。但是，斯多蒙涅可夫的說法卻成為「第三國」的這種不具明確對象的條文，加上斯

<sup>62</sup> 「蔣廷黻與斯多蒙涅可夫談話紀錄」（1936年12月9日），〈駐蘇大使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1989年11月），頁26-27；「蔣廷黻致外交部第928號電」（1936年12月10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47。

<sup>63</sup> 「蔣廷黻與李維諾夫談話紀錄」（1936年11月19日），〈駐蘇大使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頁22；「外交部致許世英第544號電」（1936年11月2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57。

多蒙涅可夫欲言又止故作神秘的態度，令蔣廷黻強烈懷疑情報內容的可靠性。

事實上，斯多蒙涅可夫所透露的3條內容，除了「第三國」的中性說法，以及實際上秘密議定書第三條僅為規範德文與日文版具同等效力之外，內容旨意與德日「防共協定」的秘密議定書大致相同，亦與李維諾夫所述差異不大，再次證明蘇聯的情報訊息確實極為精準。至於德日以蘇聯為對象的條文規範變成所謂「第三國」的中性說法，似為蘇聯自德日密約傳聞以來的一貫策略，意圖將德日兩國對蘇目標的針對性擴大為其他國家，除了減輕蘇聯的危機壓力外，亦在塑造德日締結同盟以世界各國為敵的輿論。

在此之前，程天放於12月3日應牛賴特之邀會面，牛賴特重申日德協定除了公布的文件外，並無他條件。<sup>64</sup> 8日，程天放致電外交部表示：「邇與外交團及德私人談話，多認此次日德協定係國社黨要人RIPPENTROP〔按：里賓特洛甫〕等所主動，德外長等並不積極贊成。德輿論亦有反對者，但不敢明言。」<sup>65</sup> 12日，外交部將上述蔣廷黻探悉的蘇聯情報轉知駐日與駐德大使館，並訓令「仍希嚴密注意，隨時具報。」<sup>66</sup> 但當日爆發西安事變，此後駐德使館暫時停止與外交團的會晤和宴會，程天放亦認為短期內「不便去德國外交部接洽公事」。<sup>67</sup> 直至1937年1月3日，程天放才致電外交部報告後續相關訊息：

關於日德軍事密約，蘇俄所傳，自在情理之中。此間尚傳德國擔任訓練日本空軍，供給器械，及兩國互換軍事情報等項。但究竟真相若何，不敢輕下斷語。蓋在德方，除德總理，黨部軍隊極少數最高當局外，殆亦不知真相也。外交部長是否知情，尚屬疑問。<sup>68</sup>

程天放已經探知此次協定為里賓特洛甫所主導，但是內情除了納粹黨最高當局

<sup>64</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2月3日。

<sup>65</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60號電」（1936年12月8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44。

<sup>66</sup> 「外交部分致駐日本大使館第568號電及駐德大使館第416號電」（1936年12月12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51。

<sup>67</sup> 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20。

<sup>68</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74號電」（1937年1月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52。

外，外人均不知真相。就史實而言，即使蘇聯方面告知蔣廷黻有關協定的秘密附屬議定書情報內容極為正確，然而蔣廷黻認為「是否完全正確，似尚待考」，加上歷史的侷限性，故而當下難以據此斷定為秘密條文內容。

此後因為各方查無進一步的情報，並隨著新聞熱度的消退，有關德日「防共協定」秘密條款的消息亦逐漸沉寂。如同程天放事後回憶所云：「反共條約公布的時候，大家都說附有軍事協定，但究竟真相如何沒有人敢下斷語，始終是一個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占領德國、日本，搜出當時的檔案，才知道反共條約果然有一個秘密附款。」<sup>69</sup>

## 肆、中德關係與軍事合作的影響

中國自清末追求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即對德國軍事技術充滿興趣，國防建設各層面均深受德國影響。民國肇建以來，部分地方軍閥也曾打算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以強化武力。國民黨方面，孫文曾於1920年代初期先後派遣朱和中與鄧家彥赴德國尋求支持與軍事技術協助，但德國於1919年簽訂「凡爾賽條約」後處於弱勢外交情勢與鉅額賠償問題，並且正與北京政府商訂和平條約，加上廣東方面並無資金，德方難以無償援助，對孫文的要求不置可否。1926年底，蔣介石透過張靜江請託任教中山大學的朱家驊向德國探詢，推薦軍官來華任軍事顧問。次年4月，中國國民黨清黨，國共決裂，8月蘇聯軍事顧問離華。此時國民革命軍北伐情勢統一有望，加上德國自1920年代末期因發展工商與重整軍備的需求而調整對華政策，將原與蘇聯及土耳其進行軍事合作模式推展至中國，首由德國退役陸軍上校鮑爾（Oberst Max Bauer）於1927年12月來華與蔣介石會晤洽談，並於次年11月再度抵華出任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此後至1938年7月5日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率軍事顧問團離華，在此期間德國在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如論者指出，軍事顧問「改良了軍械的品質，建立後勤、補給、訓練及人事等制度，提升了國軍戰鬥的士氣以及兵工生產的能力，

---

<sup>69</sup> 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20。

加強部隊協同作戰的能力，也勾勒出相當完整的國防藍圖。」軍事顧問同時也採取以貨易貨方式推銷德國武器以供中國整軍之需，使得中國在1936年成為德國武器最大進口國，占德國武器出口總值28.8%。中國對於德國的軍事顧問與武器依賴之深可見一斑。

德國方面，由於被「凡爾賽條約」限制發展軍備，為保存軍隊實力，在陸軍軍事廳長官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主導下，自1920年代起派遣名義上除役之軍人至蘇聯擔任軍事顧問，與蘇聯進行軍事合作，不僅進行德國軍官養成教育，而且解決軍事升遷與出路問題。在軍事顧問的居中牽線下，也開拓德國軍火工業市場，向蘇聯輸出武器用品，同時也以蘇聯為原料供應地，進口德國所需的粗鋼、礦砂與糧食等物資。1920年代末期，德國將此種軍事合作模式推展至中國，開啟中德密切的軍事與經貿關係。1933年希特勒執政後採取反共政策，德蘇關係交惡，中國反而成為德國所需原料供應國與銷售武器工業品的出口國。德國對華銷售武器的出口比值已如上所述，至於德國自中國進口金屬與礦砂的比重自1932年的2.2%至1937年亦已急升為22.5%。德國對於中國原料與市場需求的重要性亦可想而知。<sup>70</sup>

由於中德在軍事與經貿合作上具有密切關係，因此德國在1936年11月25日與日本締結德日「防共協定」後，立即透過上海的德國新聞社發表聲明：

中國各報章所論該協定之影響於中國者完全不確。蓋該協定並不危害中國主權以及其他權柄，德國對華從來採用親善政策，並且此後繼續親善。德國自知此項對日協定，完全反共即第三國際成立〔按：原文如此〕，中國對此，不必具任何項疑問，蓋中國亦正在收其剿匪之功效。<sup>71</sup>

德國新聞社的聲明主要在對中國說明協定僅涉及德日兩國，不干涉他國內政，亦

---

<sup>70</sup> 以上中德軍事合作的詳情，請參閱：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頁25-110；柯偉林（W. C. Kirby）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頁43-271；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4年6月），頁148-166；馬文英，〈德國軍事顧問與中德軍火貿易關係的推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頁135-165。

<sup>71</sup> 〈德國新聞社發表聲明 對華維持親善〉，《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6日，版6。

不影響中國主權，重要的是德國對華將持續採取親善政策。

同日，德國國防部致電克蘭，說明「『協定』之中，僅為防衛〔範〕國際化之宣傳總機關（第三國際），絕不反對任何一國家，亦不反對俄國。」並且表示「柏龍白將軍回柏林後，即與蔣委員長去一完全放心之正式電報也。」<sup>72</sup> 柏龍白當日也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云：「德日協定內容僅係防衛〔範〕國際（第三國際）煽動組織之合作，絕不反對任何國家，並對於中德友誼關係，絕無影響。中德完全互信互助之合作，始終如一，務請呈報委座為盼。」<sup>73</sup> 而克蘭在此日分別與何應欽和翁文灝會面，除了說明德國國防部來電對於協定的解釋外，也轉達了柏龍白的指示，「望竭力將所應允之原料迅予供給」。克蘭亦對翁文灝表示：「所有情形定當實告，決不謊言。惟盼中國方面亦積極進行。」<sup>74</sup>

11月26日，德國國防部再電示克蘭：「關於柏龍白上將軍第一二九號電，倘因委座不在京，不能親自呈報一切時，即請由台端以柏龍白上將軍名義將原電轉呈委座為禱。」<sup>75</sup> 克蘭分別於28日與29日拜見何應欽與翁文灝，轉來柏龍白電文，除了再次解釋德日「防共協定」絕不反對任何國家，同時表示：「對於中德友誼關係絕無影響。中德完全互信互助之合作，始終如一，務請呈報委座為盼。」克蘭並且強調：「白倫堡上將、萊謝勞將軍〔按：兵力署署長，Reichnau〕，以及國防部、經濟廳廳長都瑪思，均為中國好友，其言決無欺詐。」<sup>76</sup> 29日，何應欽約見克蘭詳談，克蘭表示：「德元首希脫勒、國防部

<sup>72</sup> 「德國國防部致克蘭電譯稿」（1936年11月25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50。

<sup>73</sup> 「柏龍白致孔祥熙電譯稿」（1936年11月25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50。

<sup>74</sup> 「何應欽致蔣介石徑未電」（1936年11月25日）、「翁文灝致蔣介石有酉電」（1936年11月25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典藏號：002-090103-00011-193、002-090103-00011-195。

<sup>75</sup> 「德國國防部致克蘭電譯稿」（1936年11月26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51。

<sup>76</sup> 「何應欽致蔣介石勘電」（1936年11月28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典藏號：002-090103-00011-192；「翁文灝致蔣介石艷電」（1936年11月29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14-084。

長白倫堡、外長紐特蘭〔按：牛賴特〕、財長沙赫脫〔按：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均明瞭惟中國強盛始能與德國共作經濟上、軍事上之互助」，並且認為「德日事初傳播時，已信其無軍事意義，現得白倫堡上將有〔按：26日〕電更益明白，無須贅言。惟目前因此事件所起華方之猜疑，須速設法擴清，並須進求更益信賴法。」因此克蘭提議為了堅定雙方互信，應速進行二事：一為速將蔣介石「面允之本年原料供給數量確實供給，並確定交貨日期，以維信用」；二為中國派有力之代表赴德締結秘密友好協定或同盟。<sup>77</sup>

此外，柏龍白亦於11月27日二度致函孔祥熙，再次解釋：「德日防共協定之簽訂，全為防禦赤化陰謀，決不影響于吾兩國之共同建設事業，此柏所敢為部座斷言者也。」話鋒一轉，柏龍白不忘提醒孔祥熙：「敝國人民所佇禱于貴邦者，為最近期間獲取大量農礦原料之供給，倘蒙部座促進此願望之實現，私衷慶慰，寧可言宣。」同時基於互利的立場上，也表示：「關於敝國所能貢獻貴邦之物品，柏終始如一，願竭綿薄，促其供輸。」<sup>78</sup>

德國國防部對中國方面的解釋與說明，透露出德國特別關注德日「防共協定」是否會影響中德軍火貿易的態度。德國在華軍火商務係由克蘭在柏林成立工業品銷售的合步樓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簡稱HAPRO）掌控，1934年8月23日，在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的推薦下，由克蘭代表德方與孔祥熙在廬山簽訂中德易貨合同，用中國原料及農產品交換德國工業產品。<sup>79</sup> 1936年4月，克蘭出售合步樓予德國政府，此後合步樓改為國有，受德國國防部指揮進行中德軍火貿易。同月8日，資源委員會委員顧振率團至德國參訪，並代表中國政府與沙赫特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sup>80</sup> 自此合步樓業務全

<sup>77</sup> 「何應欽致蔣介石艷亥電」（1936年11月29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典藏號：002-090103-00011-191。

<sup>78</sup> 「柏龍白致孔祥熙函」（1936年11月27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51。

<sup>79</sup> 「中國農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1934年8月23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324-326。

<sup>80</sup> 「德華信用借款合同」（1936年4月8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329-330。

部由德國國防部兵工署主宰，德國政府正式公開介入中德軍火貿易。<sup>81</sup>

德日「防共協定」不僅讓日蘇兩國產生嫌隙，也惡化德蘇關係，而蘇聯卻是德國粗鋼和礦砂的主要供應國。此協定一事嚴重影響德蘇貿易，反而在此時加深了德國對中國物資的依賴程度，特別是中國的鎢砂與銻礦等戰略物資。中德兩國透過物資貿易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合作關係，也在1936-37年間達到最高峰。<sup>82</sup>負責兩國易貨貿易的德國國防部憂心中國對協定的疑慮有損貿易關係，故而由柏龍白透過克蘭以及親自致電孔祥熙一再向蔣介石解釋，希望不讓此事破壞了原有的易貨協議，而影響德國所需的中國物資。

中國官方亦甚為擔憂德日「防共協定」對於中國的影響。11月26日，蔣廷黻致電外交部指出：「蘇俄極端重視此事，竭力宣傳，希冀英美法諸國之圖進一步的團結。」「英政府尚無公開表示，惟輿論反感甚強，正如蘇方所希冀。原英國對歐洲兩集團採騎牆態度，日德此舉必使英更與法俄接近，世界此後之分野必日趨明朗化。」因此建議「似宜與蘇俄採同類步驟，表示對日德秘約抱極大隱憂，益竭力宣傳該秘約所含破壞世界和平之內在的因素。」<sup>83</sup>

不過，外交部於同日就該協定發表聲明稱：

公布之協定僅三條，議定書三條。是否尚有其他約定不得而知。就已公布之協定內容，主旨在於共同防共。德日之間是否確有聯合防共之必要，乃該兩國之自身問題。<sup>84</sup>

外交部並未採納蔣廷黻的意見，聲明內容主要在表明中國的立場，不對國際情勢表態，似在避免刺激德國。12月2日，外交部致電程天放指示中國對德關係的處理方式：「目前我方對德日協定態度，一面盡量表示我方之失望與不滿，並對德方在東亞行動嚴密監視；一面仍設法與之聯絡，維持友好關係。」<sup>85</sup>

---

<sup>81</sup> 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頁161-165。

<sup>82</sup>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頁86。

<sup>83</sup>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918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82。

<sup>84</sup>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9冊，頁314-315。

<sup>85</sup> 「外交部致柏林大使館第404號電」（1936年12月2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

程天放也認為如拒德過甚，導致德與日接近，適中日本陰謀，<sup>86</sup> 乃於12月8日復電表示：「德方用意，實在造成國際反共戰線，使俄陷於孤立。」「日方用意，則對俄對華必各居其半，而離間中德關係，尤必為其附帶作用。」不過，程天放以為：「中德貿易年來進展極速，而中國原料又為德需要，德對俄自不得不與日拉攏，但若謂其甘心助日，以侵略中國，則不啻自行破壞最好市場，恐非事實。」因此認為外交部電示中國態度至為妥當，並當本此旨意宣傳。<sup>87</sup>

外交部的聲明與對程天放的訓令，說明了中國官方的態度一開始即已定調，基本上仍極力維持中德關係。然而，中國雖然已決定立場，但對於協定可能對華造成影響仍抱持疑慮，衝擊最大即為中德軍備貿易關係。12月2日，張羣致電蔣介石：「現在國際情形，瞬息萬變，我方似應如感電所陳，於表示不滿並嚴密監視發表中，繼續與德聯絡。至德籍顧問，似可轉飭主管機關，對於彼等行動先加嚴密注意，俟原訂合作屆滿，苟無絕對必要者，可陸續解僱。」<sup>88</sup>

除此之外，德日「防共協定」第一條規定：兩締約國相互通報共產國際的活動，並密切合作採取必要防止措施。由於該條款涉及軍事情報交換議題，蔣介石於12月1日致電指示程天放，向德國國防部了解該款條文的相關疑慮。翌日中午，程天放訪晤柏龍白詢問相關疑問。3日，程天放復電蔣介石表示，昨日前往拜會柏龍白詢問：「日德協定中有交換情報規協〔按：定〕，如日方要中國之德顧問供給中國軍事消息，德取如何態度？」柏龍白回答：「日方不提出，萬一有之，德國必堅決拒絕。」「因為交換情報限於共產黨的活動，決不包括第三國的國防，或其他內政事項在裏面。」最後，柏龍白表示：「他多年來是中國的朋友，以後也決不變更態度。」<sup>89</sup>

---

010102-0165-0124。

<sup>86</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2月8日。

<sup>87</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60號電」（1936年12月8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44。

<sup>88</sup> 「張羣致蔣介石冬四電」（1936年12月2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四）〉，典藏號：002-090103-00014-089。

<sup>89</sup> 「程天放致蔣介石江電」（1936年12月3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四）〉，典藏號：002-090103-00014-083；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19。

中德軍備貿易關係包含德國軍事顧問團與軍火交易，中國方面憂心德日交換情報規定會讓日本經由德國軍事顧問團探悉中國軍事情報，故而程天放向柏龍白表明疑慮，並獲得柏龍白的保證。至於中德軍火交易的軍情問題，則在前一年德日密約傳聞期間即曾爆發相關的疑慮。

日本參謀本部曾於1935年11月派遣情報部歐美課德國班長若松只一前往德國，直接與里賓特洛甫洽談防共協定事宜。日本駐德、義、英、法、蘇、土等國使館武官，以及其他旅德的日本武官，利用時機於11月30日在柏林召開4天的駐歐武官會議。<sup>90</sup> 德國方面並在12月初為日本武官安排前往參觀萊茵鋼鐵廠，而該工廠正是中國向德國訂製大砲的生產地。

該年12月12日，駐德使館商務專員譚伯羽致電兵工署署長俞大維表示，軍需署派往德國萊茵鋼鐵廠監製驗收15公分榴彈砲檢驗員江杓於7日向其電稱：「九日將有日本軍官六人入廠參觀。江杓抗議無效，將竭力籌備防範。」譚伯羽當即分函通告萊茵鋼鐵廠與德國兵工署提出抗議，並且聲明：「將來走漏消息，運輸發生事變，概由廠方負責。」德國兵工署則辯稱：「係上方命令無法阻止，當飭所屬注意。」因此譚伯羽向俞大維建議將此事轉呈高層，並請告知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轉知德方注意。俞大維立即電知財政部長孔祥熙及面告法肯豪森，同時呈報蔣介石。<sup>91</sup> 財政部方面以德國向日本洩露中國武器秘密為由，停止支付購置大砲的貸款。德國國防部經濟廳為此於1936年1月15日致電蔣介石說明：「中國財政部因譚（伯羽）先生之報告，謂有日本軍官參觀萊茵鋼廠之大炮，遂停止付給炮料代價。敝部謹向鈞座鄭重聲明：日本軍官實未嘗見及大炮，敝方擔保一切均守絕對秘密。」<sup>92</sup> 3月3日，蔣介石復電柏龍白表示：「中國在德製造軍器，自不應使他國人知悉。既承聲明，中國約定應付款項仍當照發，請勿念。」<sup>93</sup>

<sup>90</sup> 〈駐歐日武官柏林召開會議〉，《申報》，上海，1935年11月29日，版6。

<sup>91</sup> 「俞大維致蔣介石報告」（1935年12月12日），〈特交檔案——呈表彙集（三十八）〉，《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65-056。

<sup>92</sup> 「德國國防部致蔣介石電」（1936年2月15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49。

<sup>93</sup> 「蔣介石致柏龍白電稿」（1936年3月3日），收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頁49。

在此期間，蔣介石持續對內以武力為後盾，統一全國；對外整軍經武，備戰抗日，對於德國軍械的需求性不下於德國爭取中國軍火原料的重要性，而且德日締結軍事密約傳聞風傳已久，雖然蔣介石曾於1936年3月18日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表示：「不相信這個傳聞，並希望德中友好關係繼續維持。」<sup>94</sup> 但是，蔣介石是否相信並非重點，重要的是維持中德關係與軍火貿易，再加上德國國防部既已向其聲明保證嚴守秘密，因此未再追究此事。不過，結果卻因為此次日軍武官參訪萊茵鋼鐵廠事件，讓中國方面獲得德國國防部的保密承諾，因此對於德日「防共協定」第一條交換情報的規範，程天放僅提出對於德國軍事顧問團方面的疑慮，未再提及軍火交易的情報問題。

雖然如此，但中德軍事合作卻因此蒙上陰影。1937年3月，蔣介石決定利用5月間英王喬治六世（George VI）加冕典禮，派孔祥熙組織特使團出席典禮時機，展開對英軍事合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對英借款和尋求中英兩國經濟、軍事與情報合作。<sup>95</sup> 5月9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指示中英軍事合作的原則在於注重精神和基礎，具體事項包括：互換情報與參謀、協助中國沿江沿海要塞的建設並建構中國海空軍、向英國採購海空軍武器與材料等。<sup>96</sup>

然而，由於納粹德國積極擴張軍備與勢力，歐洲戰機一觸即發，英國自顧不暇。5月16日，孔祥熙電蔣介石表示：「因英現正充實本身實力，在兩年以內難以現款購買，亦苦無餘力為外人製造。」21日，孔祥熙再電稱：「英國本身現正充實軍備，所有上乘人才，自用不足。次等人才，自問亦不願推薦。」<sup>97</sup> 加上英國對華政策著重於經貿關係，遠東政策建構於英日中等距三角關係，不欲因向華

---

<sup>94</sup> 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書豪譯，《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代中德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50。

<sup>95</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3月12日、3月31日本月反省錄。

<sup>96</sup> 「蔣介石致孔祥熙佳電」（1937年5月9日），〈籌筆——統一時期（一七五）〉，《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175-019。

<sup>97</sup> 「孔祥熙致蔣介石銑二電」（1937年5月16日）、「孔祥熙致蔣介石馬二電」（1937年5月21日），〈特交檔案——對英國外交（一）〉，《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57-003。

靠攏而招忌日本，<sup>98</sup> 致使蔣介石計劃的中英軍事合作未能成形。<sup>99</sup> 不過，蔣介石的構想表明了對於德日「防共協定」的疑慮，冀望以中英軍事合作取代中德軍事關係。

蔣介石於1937年5月5日與陶德曼會晤時指出，「他在西安發表了關於德日協定不會影響遠東政治的講話，引起該地局勢的緊張化」，「張學良和共產黨指責他想使中國加入法西斯強權的陣營」，明言意指西安事變的爆發與此事有關。最後，蔣介石向陶德曼表示：「儘管德國保證，此協定並非針對中國，也不會導致德日義三國同盟，但德中關係仍因此而受創，蓋中國人民無法諒解德國此舉。」<sup>100</sup> 有關西安事變的原因極為複雜，德日「防共協定」應非是觸發事變爆發的主要因素。<sup>101</sup> 但是，亦難言此協定未對中國內部情勢造成間接影響。此時蔣介石對陶德曼的說法，應是對於德國犧牲中德關係而與日本進一步密切合作一事有所怨懟，並暗示德國對華政策的失當，中德關係確實因此受到影響。

## 伍、強邀參加協定的疑慮

1936年11月25日，《中央日報》社評針對德日「防共協定」的可能影響指出：「所可知者，德日兩國間必有一種新的諒解成立，其運用演進，必引起大規模之國際鬥爭，歐亞各國家皆不免牽入漩渦以內，其性質之嚴重，殆可想見。」就中國立場而言，「凡與中國維持睦誼之國家，皆為吾友，在相互尊重之原則下，無所歧視。惟中國不願加入任何國際陣線以為重輕。」<sup>102</sup>

<sup>98</sup> 「孔祥熙致蔣介石馬電」（1937年5月21日），〈特交檔案——對英國外交（一）〉，典藏號：002-080106-00057-003。

<sup>99</sup> 徐藍，《英國與中日戰爭（1931-1941）》（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107；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358。

<sup>100</sup> 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書豪譯，《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代中德關係》，頁57。

<sup>101</sup> 有關西安事變的原因、經過與影響，請參閱：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sup>102</sup> 〈社評 德日同盟與中德睦誼〉，《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11月25日，張1版3。

同月28日，《申報》亦評論稱：所謂反對共產主義，僅是思想問題，而且只是德日兩國各自內政議題，無法成為簽訂防共協定的理由。兩國的用意顯然是欲聯合從第三國攫取利益。事實上，兩國是企圖以反共名義干涉第三國內政。此外，「就協定本文第二條看，日德兩國對於他們認為『受共產國際威脅』的國家，都要聯合給以相當的壓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團。日本外務省的聲明又特別注重中國」，「日本這種聲明，不但漠視了中國的主權，簡直是別有作用的。」<sup>103</sup>

在國際新聞輿論方面，橫濱總領事楊雲竹彙整日本相關新聞報導，並於11月26日電告外交部指出，《時事新聞》認為德日「防共協定」將讓「日本得脫離孤立，獲德為友邦」，「希望適用第二條，勸中國參加協定，成立將對中日交涉有好影響」。然而，《讀賣新聞》則以為「對中日交涉無直接影響，中國為國家統一，應同意於防共之要求，今雖未同意，但不至反抗日德此種工作」。至於《意報》則認為「此為國民戰線擴大及於極東，實屬偏見。」<sup>104</sup> 不過，駐倫敦大使館方面則來電指出《泰晤士報》社論謂：「日本在滿俄邊境，現時有恃無恐，則其在遠東之軍隊行動益無顧忌。其在華南之侵入當更為促進。」<sup>105</sup> 此外，顧維鈞也致電外交部指出：「日德協定事，南斯拉夫報界評論謂：『係外交作用居多，日本欲於未解決中國問題之前，使德牽制蘇聯於歐洲；而德則欲使蘇聯忙於應付遠東，俾彼可在歐自由行動。』羅馬尼亞各報謂：『日德託詞防共，意在侵略。』」「赤哈報謂：『協定意在示威，而進行侵略，凡民主國均不至參加。』」<sup>106</sup> 簡言之，日本新聞界以為可以藉由協定的規範，邀請中國加入協定，共同防共。而歐洲新聞界方面則認為日本將有恃無恐而對中國採取積極的侵略行動。

事實上，日本外務省於11月25日締結協定當日發表聲明，略稱自從共產國際創立以來，在世界革命的根本方針下，破壞各國之國家與社會組織，從事於種種使世界和平大受威脅之活動。去年夏天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大會，曾決定與第二

<sup>103</sup> 〈時評 日德反共協定的檢討〉，《申報》，上海，1936年11月28日，版7。

<sup>104</sup> 「楊雲竹致外交部第64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87。

<sup>105</sup> 「倫敦大使館致外交部第267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1。

<sup>106</sup> 「顧維鈞致外交部第330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7。

國際同組聯合陣線，以反抗法西斯主義及帝國主義，並指出將以德國、日本，及波蘭等國為其未來活動之目標。同時該大會更明白決議援助中國共產黨，俾與日本作戰，近期更利用西班牙動亂干涉其內政，各國對於共產國際活動的侵害應該有所認識。而赤禍對於遠東的侵害，在中國華中、新疆、外蒙古，甚至滿洲國均已受共產軍的蹂躪。因此認為反共產國際之任何行動，必須根據國際合作，日德兩國對於共產國際，現處同樣之環境，爰特締結本協定。<sup>107</sup> 外務省聲明解釋與德國締約的原因，但是卻於聲明中特別指明中國的赤禍問題，故而新聞媒體紛紛由此點推測該協定對於中國的可能影響。

外交部於11月26日就德日締結協定一事發表聲明表示：「我國過去雖受赤禍甚深，但經政府連年之取締與剿撫，共匪已漸次肅清。今後防共工作，政府深信可持自力應付裕如。且純屬內政問題，無待與任何第三者協商之必要也。」<sup>108</sup> 意在強調中共問題為中國內政議題，避免日本藉機干涉。11月30日，蔣介石也在洛陽行營紀念週上發表對於此協定的態度，「重申中國不容許外國干涉內政的決心」，「說明中德兩國近年來非常友好，相信此種親善關係，決不致受此條約的影響。」<sup>109</sup> 顯示了中國方面非常在意此協定可能侵害中國主權，因為協定正文第二條略為規定締約國共同邀請受共產國際威脅的第三國加入協定，日本新聞界即直接點明可以依據此條款邀請中國加入。但是，未公開的秘密附屬議定書是以蘇聯為目標的防衛性政治條約，雖然各國均未能確知條款實際內容，不過卻已是國際間公開的秘密。而此事正是中國對於協定最感疑慮與困擾之處，特別是蔣介石處理日本與蘇聯兩國各別的明暗侵華陰謀時，已亟思如何運用日蘇矛盾讓中國得以獲取有利地位，此時若因該協定而將德國牽涉其中，或是被逼迫立即在日蘇之間選擇陣營，如前所述，不僅影響已經合作無間的中德軍備貿易關係，更麻煩的是將使得原已甚為糾結的中日與中蘇關係益形複雜。

中蘇兩國曾因1929年中東路事件而斷交，未久即因九一八事變促使雙方於1932年12月無條件復交。雖然中國方面曾經希望採取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

<sup>107</sup> 外務省歐亞局，「昭和十一年度執務報告」（1936年12月1日），〈執務報告：昭和十一年度歐亞局第一課〉，Ref. B10070097200。

<sup>108</sup>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9冊，頁314-315。

<sup>109</sup> 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19。

自然恢復邦交的方式，但此種跳躍式構想遭到蘇聯拒絕。復交後中蘇於1933年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交涉，但蘇方所提中立條約草案與中方要求不干涉內政及承認中國對外蒙主權等條約草案差距過大，中蘇交涉暫時擱置。此後因為1935年在華日軍策動華北事件，中日情勢轉趨嚴重，迫使蔣介石積極向蘇聯探尋合作，於10月18日主動向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提議締結中蘇軍事互助條約及建請蘇聯調停國共問題，並於該年底分別秘密派遣陳立夫訪蘇與駐蘇武官鄧文儀遊說蘇聯政府，但兩項提議均遭蘇聯拒絕，仍然僅願與中國簽訂中立條約。<sup>110</sup>

另一方面，中日兩國自1936年9月中旬起，由外交部長張羣和駐華大使川越茂進行調整國交的多次談判，會談內容演變成日本要求與中國締結「防共協定」的爭執。蔣介石認為「防共問題必須有相當代價，且須與華北問題並論」，因此感到「對倭拒絕一切尚非其時，尤以防共問題為更重要，否則不能與俄交涉」，故而指示張羣與川越交涉時，「防共以邊區為限，作為地方事件」，同時也讓蔣廷黻「知倭寇要求防共內容與範圍」，<sup>111</sup> 由其透露予蘇聯政府知曉。說明蔣介石利用中日調整國交談判防共議題的契機，冀望可以與日本方面解決華北主權問題，或者藉此由蘇聯方面取得軍事互助條約。

但由於日本嚴拒中國所提條約，僅是單方面逼迫中國共同防共，因此直至11月10日第七次會談時，雙方仍無共識。蘇聯方面雖然關注中日會談情況，但並未因此而改變簽訂中立條約的態度。同月14日爆發綏遠戰役，蔣介石於20日致電張羣：「綏東問題未了，我方對外交應不能定期開議，此勢所必然。但亦不說中止或停止等語，總勿使其有所藉口，反以破裂或停止之責加於我也。」並且指示「應即準備決裂時一切手續為要」。<sup>112</sup> 表明蔣介石已經準備停止中日會談，放棄運用此次會談機會由日本或蘇聯方面獲取欲得之利益。

未及數日德日「防共協定」公布，使得中國方面疑慮同為交涉防共議題的中

---

<sup>110</sup>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57。

<sup>111</sup> 《蔣介石日記》，1936年9月26日下週預定表、10月10日、18日、22日。

<sup>112</sup> 「蔣介石致張羣號已電」（1936年11月20日），〈革命文獻——華北局勢與對日交涉（二）〉，《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200-00026-083。

日調整國交會談可能因為該協定產生「纏結現象」，<sup>113</sup> 對中國造成對日結束談判的壓力。因此如前所述，外交部於11月26日就德日締結協定一事發表聲明，指出中共破壞活動為內政問題，即是擔憂被日本透過德國強邀中國共同防共，以及日本據此積極對華採取侵略行動。甚且在蔣介石的構想中，若於中日調整國交會談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尚有收回華北主權利益的可能性，<sup>114</sup> 但若是日本透過德國施壓中國而加入中德日「防共協定」，則將一無所獲。不過，因為日本已於中日會談拒絕中國的條件，此時蔣介石也已放棄繼續與日本談判，自然不可能加入對於中國國內毫無利益可言的德日「防共協定」。

在外交部發表聲明的同一日，程天放致電外交部指出，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廣播謂：「日德協定係二大文化國家對共產國際陰謀作防禦戰，歡迎其他國家加入。」兩國條約簽署者里賓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公共也在報章發表相同談話，「並登載日外務省聲稱，對中國所受共禍引述頗詳。」蘇聯駐德全權代表也對程天放表示：「日德同盟，德之用意在對俄，而日之用意在對華與對俄並重。」<sup>115</sup>

翌日，駐日使館致電外交部，報告偵得日本內部評估如何對華運用此協定的情報：

日當局考慮防共協定對我之影響：甲、逆料我國必將加入英美集團，彼亦有防止之必要。乙、對我將適用於左列各情形：一、共產軍侵入內蒙古或華北五省或偽滿，而我政府無力討伐時，日本進兵內蒙華北五省，此時德義兩國對日本行動，將予以承認，並視情形，或予相當援助。二、中俄相提携，攻至內蒙或偽滿時，日受德義之援助。三、共產黨對日之恐怖，以為今後將益趨猛烈，此時我政府如無取締之實力，日本將對山東之一部（料是青島）或海南島為保障佔領，德義將從側面予以援

<sup>113</sup> 「纏結現象」是從量子力學的數學式裡推導，意指有共同來源的兩個微觀粒子之間存在著某種糾纏關係，不管它們被分開多遠，只要一個粒子發生變化就能立即影響另外一個粒子。

<sup>114</sup> 蔣介石在中日調整國交會談期間曾認為：「華北五省主權無論如何必欲收回，不能成為特殊地位，寧允其共同防俄。」請參閱：《蔣介石日記》，1936年10月6日。

<sup>115</sup> 「程天放致南京外交部第350號電」（1936年11月26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5。

助。<sup>116</sup>

就甲項而言，日本防止中國加入英美集團的作法，理當為邀約中國加入此協定。乙項各點情形，其意旨略為日本將依據協定規範與德國的支持，以防衛中共為藉口，強力干涉中國內政或對華展開積極侵略活動。事實上，甲、乙兩項亦可視為同一問題，即無論中國加入與否，日本均可視情況依據協定第一條或第二條的規範為由，對華採取行動。

駐義大使劉文島於11月28日致電外交部稱：「此間謂：日德協定用意，日本首在誘我加入，使彼師出中國有名，使我孤立。」<sup>117</sup>可謂簡明扼要地點出了日本締結協定的對華目的。程天放與劉文島的來電與駐日使館的情報訊息讓中國方面以為日本可能運用協定另行推動積極對華政策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因此，當陶德曼奉德國外交部訓令於11月27日拜會張羣，「力言德日協定旨在防共，與中國政治及中德關係毫無影響，以後仍必繼續增進兩國友誼。」張羣趁此次會晤對之提出5點疑問，包括：

1. 協定第二條日文所譯之中文，均載締約國應對第三國採取防衛措置。而德文及英譯文則謂邀請第三國，究竟孰是孰非？
2. 德日議訂該協定時，其心目中對於第二條所稱之第三國，究指何國？中國是否在內？
3. 議定書第二條規定，締約國對國內國外直接或間接云云之人，應採取嚴厲措置，範圍廣泛，究何所指？是否包括在中國從事共產之中國人或外國人？
4. 議定書第三條所稱常設委員會已否成立？如何組織？
5. 日方謂，此事係日方發動，其發動之真意何在？

陶德曼答稱：第一點應為「德文諒係正確」；第二點則認為「中國當不在內」；第三點說明「僅指締約國管轄所及之人」。不過，陶德曼卻無法當即表明

<sup>116</sup> 「東京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67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099。

<sup>117</sup> 「劉文島致外交部第191號電」（1936年11月28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12。

德國政府的態度，最後只能表示：「對上開各問均須請示政府後可確答」。張羣當即表明中國自力剿共的一貫政策，深盼德國不因此協定而有不利於中德友誼的行動。<sup>118</sup> 張羣的話透露出兩項期望，前者在暗示德國不可被日本利用此協定干涉中國剿共內政或者進一步據此侵略中國；後者則表明不要因為此協定而影響中德軍備貿易與友好關係。

不過，陶德曼卻遲未回復。在此期間，駐日使館於11月29日致電外交部表示：「此間日日新聞亦載稱：日外省當局昨已表明，日本尚無立即為勸誘義大利參加此協定之意圖，對於第三國參加之問題，尚未作相當考慮。」<sup>119</sup> 12月2日，駐日大使館又電稱：「德參事今日告人，日德協定絕無助長日本侵華之意。」同時告知：「駐華德國使館奉柏林訓電云：『議定書第二條規定之國內、國外，係指互相引渡在締約國之一國境內從事共產活動而逃往他締約國境之各國人民。』明日由德使向鈞部解釋。」<sup>120</sup> 翌日，駐日使館再來電報告指出，今日外相有田八郎接見外國記者逐點解釋協定的相關疑義：

1. 議定書第二條注重嚴峻懲治其國內國外共產者，除德日境內本國人或外國人應盡量懲治及交互引渡外，其德日籍人民在第三國境內直接間接作共產生活者，俟其返歸德日境內立即予以懲治。
2. 日本要求中國防共在與德商談之前，此為截然兩事，而且現在並無會同德國邀請中國參加之意。
3. 協定防共非僅為交換情報，因各國防共上各有特長，故應合作研究充分辦法。
4. 單獨與德國訂約，係因第七次防共國際大會以德、日、波蘭為活動目標，故須自衛。本協定並無排他性，不能解作法西斯的結合，但英法在未被邀請以前已表示不欲參加，故無法邀請。

---

<sup>118</sup> 「外交部致柏林大使館第399號電」（1936年11月27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02。

<sup>119</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70號電」（1936年11月29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13。

<sup>120</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75號電」（1936年12月2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3。

5. 蘇聯本身向未否認共產，本協定並非以蘇聯為目標。若蘇聯現如認二者為一體，則日俄關係必將惡化。

記者提問：「共產活動侵入察綏，如日本出兵，德國是否有出兵之義務？」有田答復並無義務。記者再追問：「共產黨萬一危及國民政府，日方是否援助南京？」有田指出此為協定以外之事。至於有關中日一般防共之事，有田鄭重表示：「中國不願談判此事，內部主張而外尚有外力影響〔按：原文如此〕，在此情況下，日本只為等待。」<sup>121</sup>

駐日使館各件詳細的報告，讓中國方面先行知道日本目前暫無會同德國邀請中國參加協定的意圖。但是，中國方面卻苦等不到陶德曼答復有關德國的態度。12月2日，張羣致電蔣介石稱：「中日談判時，日曾屢次邀我聯合防共陣線，日方邀我加入，自在意中。德是否依照協定與日本共同邀請，尚不可知。本部已請德方確答此點。倘德方果無此意，我方自應如鈞座指示，請其正式聲明。惟恐彼既與日本勾結，不願單獨行動。但縱日德共同邀我，我既闡明以自力剿共為一貫之政策，且為免傷俄法英感情計，自應堅拒。」<sup>122</sup>

由於蔣介石指示應請德國正式發表聲明，外交部立即於當日致電訓令柏林大使館表示：「部長向陶大使提詢五點，迄未據復，應由該大使親晤德外長，逐項詢問，尤須注重第二問，並告以中國歷年自力剿共，成績昭著，為德國所深知。倘德國果無邀請中國意，應請其正式聲明，藉以祛除中國人民之懷疑。」<sup>123</sup>

12月3日午前11時半，程天放備好問答材料到德國外交部拜會牛賴特，等候20分鐘始得會面。該協定為納粹黨人里賓特洛甫主導並簽署，卻由外交部窮於應付外界各方質疑，程天放的久候似乎顯示德國外交部對於中方糾纏協定細節瑣事感到不耐。雙方就張羣對陶德曼所提各點進行質問與說明。首先，關於協定第二條日文與德文文義不同事。牛賴特謂：「渠接陶大使電後，已去電日外省，詢

<sup>121</sup> 「東京大使館致外交部第678號電」（1936年12月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30。

<sup>122</sup> 「張羣致蔣介石冬四電」（1936年12月2日），〈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四）〉，典藏號：002-090103-00014-089。

<sup>123</sup> 「外交部致柏林大使館第404號電」（1936年12月2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24。

問得復，日外省文義與德本同，想係日報紙誤載。無論如何，應以德所宣布者為準。」

其次，程天放表示中國最關切的一點是德國有無邀請中國參加反共協定之意？牛賴特答復：「德政府深深了解中國處境，除中國自動願意，德決不邀請。」程天放按訓令的要求追問：「可否請德國外交部對此點發表一個聲明，以祛除中國人民的疑慮？」牛賴特為難地表示，德國無意邀請中國以及英、美、法、波等國參加，若對中國聲明，則對其他各國亦必要求，此點難以辦到。程天放乃詢可否將此次兩人關於此點之談話，在報紙發表？牛賴特同意由中國外交部在報紙正式發表。但是，係指在南京而不宜在柏林發表，以免其他各國相繼前來提出相同要求。因此程天放建議外交部：「如鈞部正式發表駐德大使面詢德外長有無邀請中加入之意，德外長答並無此意，似亦可代德方之正式聲明。」

再次，議定書第二條有關締約國對在國內外從事共產活動之人採取嚴厲措施之規範，是否包括在中國從事共產之華人或外國人的疑慮，牛賴特云：「決不包含在中國從事共產活動之人在內，蓋德政府絕對不願干涉任何國之內政。」

再者，關於議定書第三條成立常設委員會事，牛賴特表示：「德警廳中向有專門從事偵察共產之機關，以後此項工作仍歸原機關辦理，不另有其他組織。」程天放詢問此項機關是否仍歸內政部指揮？牛賴特答稱：「當然仍屬內政部」。

最後，程天放指出日本報紙載稱此協定係由日方發動一事，牛賴特謂：「談判進行係在柏林，雙方均有防共之意，不能謂日方主動，而德方被動。」

結束中國方面的5點疑慮後，程天放按例向牛賴特陳述中國歷年剿共情形，並稱此政策始終不渝，而且中國決不會任其他國家假借反共名義損害中國主權。牛賴特表示：「德政府深解此意，故在與日談判時一再聲明，德政府決不因訂此協定，而對中國有絲毫惡意。此後亦決不肯使此協定成為壓迫中國之工具。」<sup>124</sup>

當日程天放將談話詳情電告外交部，雖然外交部表示對德國各點解釋感到滿

---

<sup>124</sup> 《程天放日記》，1936年12月3日；「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55號電」（1936年12月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33；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19-20。

意，惟有關第二點為蔣介石的指示，訓令再次要求牛賴特發表聲明，公開言明無意邀請中國參加協定。12月4日，程天放回電謂：「關於德方正式聲明一節，鄙見以為，德政府能辦到最好，倘德政府因恐牽涉他國，不願自動聲明，可否由我方書面詢問，彼方書面復代之。」同時認為：「陶大使似已請示德外部，不日當有答復。放認為似可俟答復到部，此間再約期與德外長晤談。」<sup>125</sup>翌日，外交次長徐謨復電：「姑俟陶大使復到後，再行辦理。」<sup>126</sup>

一週後發生西安事變，同月底事變結束。程天放於1937年1月3日致電外交部，詢問陶德曼是否前去外交部答復，同時認為自公布協定已過40日，此時中國公布是項消息為時已晚，因此建議：「可否請部長利用對新聞記者談話，或紀念週報告，涉及中德關係時發表此項消息，則較不落痕迹。」<sup>127</sup>陶德曼方面仍遲未答復，外交部乃電示程天放，同意不再堅持要求德國正式發表聲明，但仍要求以談話紀錄方式發表。只是當程天放拜會牛賴特，請其在談話紀錄簽名時卻遭拒。牛賴特認為現在距當時訂約已1個多月，沒有再發表談話的必要。程天放無奈地據實電告外交部，並請示後續交涉態度。外交部似乎也認為時機已過，無意再與德國糾纏此事，未再有相關電令予程天放，中德交涉就此結束。<sup>128</sup>中國雖然未獲得德國正式聲明無意邀請中國參加協定，但至少已明瞭德國的態度，確認日本無法利用協定藉口德國的支持來壓迫中國。

雖然中國方面迅速地降低德日「防共協定」對中德與中日關係的影響，但該協定卻悄悄地對東亞國際政治情勢產生變化。蔣介石面對日本成功拉攏德國後的東亞情勢以及蘇聯遲遲不願與中國簽訂互助條約，於1937年年初雖然曾經考量與日本重啟交涉的可能性，但其外交規劃的重心仍在考量以英法為介對蘇聯進行交涉，或者以國聯為基礎與蘇聯合作，並運用太平洋和平會議的召集，進行親英聯美路線，亟思「進行太平洋各國會議以制倭」，故而有前節所述中英軍事合作的

<sup>125</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57號電」（1936年12月4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41。

<sup>126</sup> 「徐謨致柏林大使館第411號電」（1936年12月5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43。

<sup>127</sup> 「程天放致外交部第374號電」（1937年1月3日），〈日德協定〉，典藏號：020-010102-0165-0152。

<sup>128</sup> 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頁20。

推動。同時也於3月5日與美大使談話，洽商籌備太平洋和平會議的可能性，並計劃邀請與太平洋有關之各大國參加。<sup>129</sup> 另外，也於4月透過英國表達了中國將與英、美、日共同協商解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華北走私等問題的意向。<sup>130</sup> 此後蔣介石外交構想推動的詳情與結果非本文論述主旨，在此不予詳述。

此外，民國知名報人龔德柏曾於1949年12月28日受邀在陸軍大學演講，就中日戰爭一事認為開戰太早，指稱：「日本本來是要打俄國的。它與德國訂結『防共協定』，就是到了快要動手的時候了。」「但是，蔣〔介石〕委員長似乎就沒有日德要打俄國之預料，所以日本進占北平天津，他就決定在上海展開全面戰爭，與日本死拚到底。結局日本要打俄國的戰爭，我們搶過來打。反使應該挨打的俄國，不但最初做壁上觀，最後竟加入戰爭，不費吹灰之力，而占領我東北，以給中國共黨，使中國受致命的打擊。」<sup>131</sup>

有關中日兩國因盧溝橋事變衝突引發成為八年戰爭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棟，事實上，蔣介石對於德日以蘇聯為目標一事早已瞭然於胸，戰前對於「日蘇先戰」的殷殷期盼，一直是盤算應付日本壓迫的戰略規劃；<sup>132</sup> 中日開戰後爭取與蘇聯締結互助條約，也是促使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努力。<sup>133</sup> 至於德國方面，蔣介石曾經在1936年11月26日得知協定發布訊息後指稱：「德徒見武力而不重外交，其愚極矣。」<sup>134</sup> 可知，蔣介石對於德國以蘇聯為目標的武力侵略方式並不以為然。

就日本對蘇備戰期程而言，在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石原莞爾的推動下，該課於1936年7月籌劃五年期的「戰爭準備計畫方針」，預訂於1941年完成對蘇戰爭的準備。陸軍省依此方針構想，於1936年11月制定「軍備充實計畫大綱」，計畫於1942年完成對蘇軍備充實擴張方針。廣田弘毅內閣接受陸軍方面的對蘇戰備優先策略，於該年底通過昭和12（1937）年度預算案，大幅擴充所需的軍事

<sup>129</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大事表、1937年政策、1月5日、3月5日。

<sup>130</sup> 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頁358。

<sup>131</sup> 龔德柏，〈蔣介石黑獄親歷記〉，收入李敖編著，《白色恐怖述奇》（臺北：李敖出版社，2002年），頁223-224。

<sup>132</sup>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195-220。

<sup>133</sup>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171-191。

<sup>134</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26日。

費用。此外，滿鐵調查部受參謀本部委託，以強化重工業與軍需產業為目的，於1936年8月提出「日滿產業五年計畫」。次年5月，該計畫移交陸軍省，更名為「重要產業五年計畫」，並於6月經近衛文麿內閣通過採行，計畫在滿洲生產戰爭所需的武器與軍需品。<sup>135</sup>由此點觀之，日本在對蘇備戰期間，對於蘇聯應會採取避戰方針，而且日本預定對蘇開戰時間是在完成備戰後的1942年，並非1936年底簽訂德日「防共協定」之時。

就德日簽訂「防共協定」動機以及秘密附屬議定書內容，略為遭受蘇聯威脅或攻擊時，另一方締約國有義務不採取減輕蘇聯負擔效果的措施等消極性規定，並非是積極性的同盟互助條約，意在使蘇聯左支右絀，顧此失彼，難以專一全力應付東西任一方的壓迫，以減輕德日任一國來自蘇聯的威脅，可謂完全符合大島促成德日聯合的初步構想。此後至1940年9月19日，日本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通過「關於日德義樞軸強化之件」，決定在對蘇、對美政策相互協力之下，與德義兩國進行軍事同盟交涉。<sup>136</sup>同月27日，該三國才在柏林簽訂具有積極性質的「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

德日「防共協定」可視為日本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第一步，而非共同合作對蘇開戰的軍事同盟。以該協定作為評斷日本已經準備對蘇開戰的警訊，並進而評論中日戰爭，其實是忽略日本國防戰備實情，並且簡化國際複雜局勢的變動，同時也無視於中日關係的緊繃情勢。

## 陸、結論

德日兩國於1936年11月簽訂「防共協定」，係透過秘密條款以蘇聯為目的防衛性政治條約，可以說是國際上合縱連橫的一環。德日兩國均聲明該協定在共同防禦共產國際，並無任何秘密條約，自然難以取信於國際社會。雖然蘇聯情報已

---

<sup>135</sup> 川田稔，《石原莞爾の世界戰略構想》（東京：祥伝社，2016年），頁185-193；黑野耐，《日本を減ばした国防方針》（東京：文藝春秋，2002年），頁175-193。

<sup>136</sup> 「日独伊樞軸強化に関する件」（1940年9月4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二次州大戰と日本》，第1冊（東京：六一書房，2012年），頁210-211。

偵悉秘密議定書大致內容，中國方面亦透過駐蘇大使蔣廷黻獲知該項情報，但仍難以確認情報內容的可靠性。

身為弱國的中國在國際列強競合消長之中，能主觀地期望產生多少合縱連橫作用力尚屬疑義，但面對德日聯合的趨勢，則被動地努力減緩德日「防共協定」對中國的傷害。首先，中德在表面上仍然維持友好關係與軍事合作，但實質上兩國關係已經受創，軍事合作也有疑慮，蔣介石構思欲以中英軍事合作取代卻未能成功。結果中日戰爭爆發後未久，中德軍事合作即告結束，中德關係亦降至冰點。其次，赤禍問題方面，外交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明言可自力應付防共工作，並強調中共問題純屬內政議題，意在避免日本利用此協定干涉中國內政。最後，該協定有邀請第三國參加之條款，加上德日締約公布之時適逢中日調整國交會談期間，中國方面積極透過外交管道與德國外交部確認並要求保證，以避免日本藉由德國施壓中國而取得於中日會談期間未能交涉成功的中日防共條約。在此過程期間，中國各駐外使館對於該協定各種訊息的偵查與回報、南京方面處置方式與指示，以及蔣介石於1937年籌謀的外交構想等，印證了「情報驅動外交」觀點有關情報資訊內容對於外交活動的作為與政策的制定確實息息相關。

最後，經由中國方面偵查德日「防共協定」的秘密條款，以及積極與德國外交部交涉防止協定對中國的影響，可知中國對於國際情勢訊息，主要來自於駐外使節向各國使節團探訪、新聞報紙報導，以及各方偵查等。而中國與德國的關係，除了傳統官方外交關係外，尚有蔣介石掌控與德國國防部有關係的軍事合作渠道，似乎並未有與德國納粹黨之間有密切而且直接的管道。此點不同於日本由駐德武官大島浩透過納粹黨人里賓特洛甫建立起的德日關係，該兩國甚至於此基礎上進一步於1940年締結軍事同盟。此案例顯示出1930年代中德關係與德日關係的本質差異，前者主要建立在傳統官方關係；後者則與納粹黨關係密切。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內務省》（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外事警察資料：コミンテルン第7回世界大会の概況〉。

《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日德協定〉。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執務報告：昭和十一年度欧亜局第一課〉。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籌筆——統一時期（一七五）〉。

〈革命文獻——華北局勢與對日交涉（二）〉。

〈特交檔案——對英國外交（一）〉。

〈特交檔案——呈表彙集（三十八）〉。

〈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一）〉。

〈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四）〉。

〈特交文電——對英法德義關係（六）〉。

### 二、史料彙編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二次欧州大戰と日本》，第1冊。東京：六一書房，2012年。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6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9冊。臺北：國史館，2009年。

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駐蘇大使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1989年11月）。

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年-1947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書豪譯，《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代中德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 三、回憶錄、傳記、日記

《程天放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

程天放，〈德日反共條約——使德回憶之九〉，《傳記文學》，第4卷第6期（1964年6月）。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

龔德柏，〈蔣介石黑獄親歷記〉，李敖編著，《白色恐怖述奇》。臺北：李敖出版社，2002年。

### 四、報紙

《中央日報》，南京，1936年。

《申報》，上海，1936年。

### 五、專書

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東京：南窓社，1975年。

三宅正樹，《近代ユーラシア外交史論集：日露独中の接近と抗争》。東京：千倉書房，2015年。

川田稔，《石原莞爾の世界戦略構想》。東京：祥伝社，2016年。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5）：三国同盟・日ソ中立条約》。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

田嶋信雄，《ナチズム極東戦略：日独防共協定を巡る諜報戦》。東京：講談社，2001年第2刷。

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臺北：國史館，1999年。

李敖編著，《白色恐怖述奇》。臺北：李敖出版社，2002年。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 版社，1996年。
-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
- 柯偉林（W. C. Kirby）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徐 藍，《英國與中日戰爭（1931-1941）》。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新華書店，2003年。
- 黒野耐，《日本を滅ばした国防方針》。東京：文藝春秋，2002年。
-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 Kerr, Pauline, and Wiseman, Geoffrey.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六、期刊論文

- 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4年6月）。
- 周惠民，〈德國對「滿洲國」及「汪政權」的外交態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
- 馬文英，〈德國軍事顧問問題與中德軍火貿易關係的推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

